

□蔡天新

2010年秋天,我应邀赴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讲学,趁机游历了克里米亚和黑海之滨的历史名城敖德萨,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前苏联著名的艺术之都,敖德萨有着浓厚的人文底蕴。它与音乐的关系,就像法国的波尔多与葡萄酒的关系一样。敖德萨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和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巴比尔的出生地,也是抽象主义绘画创始人康定斯基长大的地方,后者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学教授任上开始画家生涯的。

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盖尔范德也出生在敖德萨郊外,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有一次他得了阑尾炎,要求父母答应买一本《微积分教程》才同意开刀,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机。盖尔范德在泛函分析领域独树一帜,建立了赋范环论,即巴拿赫代数。他曾三次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荣获首届沃尔夫奖,与印度的拉曼纽扬、中国的华罗庚并称为三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

那次我住在敖德萨老城区的一家小旅店,当我漫步在以“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命名的大街,走过一座院落门口时,忽然在通道幽暗斑驳的墙壁上找到灵感,拍摄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幅抽象作品。在海水般湛蓝的墙壁上,有两条游弋的鱼,底下那条横着游,尾鳍像是划水的手臂;上面那条像蝌蚪,正奋力上升。没想到我的德文翻译看后很喜欢,后来这幅作品还被用进我在法兰克福书展讲座和朗诵的海报。

我在敖德萨的最后一天,在大街小巷漫游中度过,寻找拍摄的灵感或冲动。翌年春节过后,我获得一次机会重访纽约,在曼哈顿的居民区徜徉时,发现那里的街道可谓抽象摄影的天堂。除了墙壁,还有一些灯柱、信筒、电线杆、配电箱和垃圾桶值得留意。我终于明白,一座城市的文明或文化最终体现在居民区的街道和墙壁上。当然,那种被政府统一处理过的除外。一发不可收,我一路拍摄至中美洲诸国。

2012年,我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访问期间,走遍了从寓所到办公室每一条可以通行的路线。等到秋天来临,我飞往东非五国和民主刚果(埃博拉病毒的发源地和命名地)。在印度洋海滨的达累斯萨拉姆,我找到了抽象摄影的又一个天堂。那些生锈的铁门上,残留着被撕去的纸张痕迹;在没有涂鸦的墙壁上,表层墙体的脱落会显露人类或动物不同寻常的情感。之后我又以缪斯之名,造访了墨西哥(阿兹台克和玛雅)、秘鲁(印加)和伊拉克(苏美尔、巴比伦和阿巴斯)三个文明古国。

通常人们会认为,抽象是数学和哲学的特质,现代数学的分支甚至至有“四大抽象之花”。实际上,抽象也是现代艺术的共性,这一点,20世纪以来的绘画和雕塑



从看见到发现

可以证实。古希腊的全才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艺术的起源。在现代艺术诞生之前,一切创造实践都离不开模仿。换句话说,是对人的普遍经验的模仿,不同的是,仿制的技法和对象不断更新。美的感觉要求有层出不穷的新的形式,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通过对经验的描绘直接与大众对话,已经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情了。

回顾我本人的创作实践,即便那些具象作品(尤其是风景),也可以从中窥见某些抽象的特质。比如2002年的《正午的月台》、《乡村公路》,2004年的《提尔的鸟笼》、《地中海》、《泰晤士河》(2008)和《门德尔松的花园》(2010)中的那两把椅子,还有《黑海》(2010)、《冰湖》(2011)和《街景》(2012),等等。我完全能理解,为何“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灵感最初来源于故乡普鲁旺斯的山区景物。

我曾在《诗的艺术》中提及,现代艺术的主要特点是从模仿上升到它的高级形式——机智。1943年,毕加索把自行车的三角挡拆除,让坐垫和把手连在一起,形成一只《公牛头》。夏加尔的《提琴和少女》(1955)让提琴倒置在地上,使得提琴和少女的臀部融为一体。在《京都的黄昏》(2008)里,我也让被俯瞰的古都和桌子上方的灯笼合二为一。

如同西班牙哲学家桑塔耶拿所言,机智的特征在于深入到事物的隐秘深处,在那里练出显著的情况或关系来。依我看来,这就相当于:从看见到发现,抽象摄影更接近“新绘画”或“新艺术”,但它依然是

真实的,我不喜欢电脑合成,也不愿意学习这一技术。可以说,我的相机“不会撒谎”,依然是世界的窗口或镜子。

1958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负载理论(theory-loaded),他认为人们的视觉经验取决于文化等因素。由于原有的经验、知识和理论背景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图形可以产生不同的直觉,在同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东西和意义。不仅如此,科学发现也是这样,汉森认为它是一个逆推的过程,这就把摄影与科学发现相联系。他的同行、物理学家兼史学家库恩进一步指出,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变是科学革命。这里的范式是科恩哲学的核心,表示某种派生的思想和概念的发端。

最后,我想说说汉森的传奇人生。他原是一名小号手,曾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后因战争中断音乐生涯。他加入了海军,成为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两千多小时后退役,而后努力成为一位学者。先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继而来到英国,入读牛津和剑桥大学,获双博士学位。随后任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建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并任主任,执教耶鲁,并重新飞上蓝天。1967年,他驾驶爱机在雾中前往伊萨卡,途中坠机身亡,年仅42岁,留下多部未完成的著作。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随笔和游记作家)

名家言

多“用具”还是多“用脑”

□刘天放

作为教师,我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学习条件变好了,反而不少学生学的东西不如过去的学生扎实了?除了与大家不断声讨的“应试教育”有很大关系外,是不是与越来越多教师的简单化教学以及学生的简单化学习有关呢?换句话说,除了其他已知原因,是不是与教师过度使用辅助教学设施或学生过多使用学习用具,使“用脑”越来越越少地参与教学和学习过程有一定关系?

比如学外语。都言称现如今合格的翻译越来越少,供人欣赏的翻译佳作多出自过去的翻译家之手。以前的翻译大家如傅雷、林语堂、叶君健、朱生豪、杨宪益、朱光潜、萧乾、沙博理、罗念生等有很多,且人家还不止精通一门外语。在后人看来,其成就简直无法逾越。可想一想,这些大家在当时学习外语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当年仅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学习,别说现在孩子们手里的那些复读机、学习机、翻译机乃至互联网移动手机,当年连一台笨重的台式录音机都没有。

而以上大家哪个不是数门外语兼通、功底扎实、博览群书、中西贯通,同时具有大家风范?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就有中西博学的“牛人”教师连讲义都没有。为何?因为扎实的知识功底令他们上课根本不用教案或讲义。许多老师出口成章,学生记笔记一学期下来即是一本教科书!他们靠什么?在没有多少辅助教学手段的年代为何有如此多大家?

简单地说,除了这些大家刻苦用功和具有聪颖的头脑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没有那么多学习辅助工具的干扰,不依赖辅助工具,全凭自己的用脑,用心、动手、动口等来完成学习过程。这些大家的头脑里储存的知识,可不是仅靠辅助学习用具“辅助”来的,而是靠超人的毅力一点点积累的。

反观现在的学生,生长在信息年代,电子产品对他们来说像过去孩子们踢毽子或跳绳那样普通,孩子们就这样有意无意地被束缚在学习辅助工具上。时代进步了,辅助教学仪器和设备先进了,按说教学效果也该变好了,遗憾的是,孩子们的功课似乎不扎实了。教师也没有摆脱“辅助教学用具”的束缚。辅助教学用具的过度使用有时候甚至替代了教师正常且无可替代的讲解;“辅助”教学用具反倒成了喧宾夺主的“主讲”工具。教育界为了搞“创新”,不停地创造“新概念”:自主学习、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等,不一而足。

本来,运用辅助教学手段无可非议,可无论怎样,机器终究无法代替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勤奋和学习动力,离开了用脑、用心、动手、动口等“原始”学习方式去学习,对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偷懒行为、逃避行为,对教师来说即是一种浮夸行为、取巧行为。如今,学生不再多用思考的方式,而是频繁使用学习机、翻译机、复读机、手机……就一切搞掂。教师较少通过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亲身传授去讲课了,带动学生去用脑思考的过程也简单化了。教学内容中厚重的文化内涵,对字词和背景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挖掘等,也朝着简单化趋势发展。这样,除了能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些所谓的“便利”和“省时”,除了给教师和学校带来一些所谓的“创新”教学法和“教学成果”外,有多少实际效果实在很难说清楚。本人有幸听过一堂主要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外语课,只见授课教师围着电脑转圈,一会儿开启视频,一会儿讲解荧屏上的要点,一会儿又忙三迭四地复述上面的内容,忙得满头大汗。而下面的学生却一脸茫然,紧跟讲课的快速节奏,别说记笔记,就连跟不上听讲都成了问题。我没看出这堂课的重点在哪里、知识点在哪里,记忆中好像只是把那些该放在屏幕上的内容都放上去了,仅仅做到了“不缺项”而已,更像是在“堆砌”授课内容,而不是讲授。

“辅助学习用具”就是一把双刃剑,“用脑”和“用具”不是对立的。辅助教学用具不是不可以用,但要看看怎么用。需要时就用,不需要时就不用。用好了,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如果滥用,就有可能帮倒忙。教师的“教”是根本,而辅助教学设施只能是“辅助”。教育界该对此做些反思。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心机学

让青春期男孩爱上运动

□戴群

男孩子在青春期比女孩更容易体验到成长的烦恼,往往会在内心聚集一团激情的火焰,如果没有很好的输出渠道,他们常常会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也不知自己为什么暴怒,而暴怒的对象往往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明白,就会到处找原因,不是责备孩子就是责备自己。

那么如何和孩子一起创造一个输出正面能量的渠道呢?

首先是运动。如何引起孩子对运动的兴趣?朋友一家两个儿子,父母都很忙,不能带他们运动,就和孩子商量加入了一个划船俱乐部。父母的初衷可能是希望孩子有点特长,将来考上剑桥大学(剑桥的划船俱乐部很有名)。两个儿子迷上了这项运动,坚持了几年,后来凭借优异成绩都考上了剑桥大学,入学后加入学校的俱乐部,很快就融入了学校生活。我的儿子从小就喜欢运动,8岁后爸爸受他的影响也爱上了运动,两人常在一起研究健身、营养,研究人身体的成长科学。

我们不能逼迫不喜欢动的孩子去运动,利用孩子的天性来引导会容易一些。孩子的天性是喜欢挑战,喜欢比赛,喜欢鼓励,喜欢有同龄的伴儿,所以不管是在家还是参加俱乐部,只要顺应了天性,就可以尝到最初的运动的甜头。这个甜头就是人会变得精力充沛,更好地集中注意力,睡眠也会变好。父母适当奖励,慢慢孩子就会有运动的习惯了。习惯需慢慢养成,允许反复,允许退步。运动不影响学

习,正相反,运动健将往往也是学习的尖子。当然这不包括国内父母因孩子学业无望而把他们送进体育学校。

培养兴趣时,兴趣是关键,绝非强迫而成。很多父母打着给孩子培养兴趣的名义逼孩子练琴、运动、画画,且不说大多数父母坚持不下来,就是少数坚持下来了,培养的可能是职业而不是兴趣。所以“培养”一词本身就有问题,应该是发现兴趣,兴趣发现了就找到了正面能量输出渠道。

其他的能量输出渠道也很多,都是基于兴趣。孩子对手机感兴趣不是兴趣,是瘾。兴趣源于天赋,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发现天赋是一件再美妙不过的事了,这个过程会使孩子的自信大增、亲子关系融洽、人生幸福提高。如何发现天赋?答案是增加孩子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出行和社交,孩子一定会在亲近自然和与他人交往中发现自己。这个道理很简单,一大帮小朋友一起玩,很快就能看出谁是领导者,谁是跟班的,谁是调解人,谁有暴力,每一种角色都有利有弊,正面引导就可以发挥长项,这对于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父母本身就没有什么兴趣怎么办?没关系,父母可以对孩子的兴趣予以引导。我的儿子设计卖糖机时把我当成第一用户,我在用的过程中不但给予很多肯定,也会发现问题。他最喜欢我发现这个问题,这样他能去改进,试用时我再给予肯定。我永远不会在他兴趣正浓的时候问“你的作业写完了吗”这样扫兴的话。

父母参与的过程决不是对孩子的监督指导。比如有些父母和孩子一起学琴,

目的是为了回家引导孩子。孩子不需要你的指导,他需要的是你的肯定。即便你是专家,对孩子也切忌指手画脚,要知道孩子的进步取决于兴趣,取决于主动性,如果你是专家,就更应该明白孩子学习过程的各种艰难以及孩子大脑发育对其做事的局限性。

读书也是一种能量输出渠道。孩子读书习惯不同,有的喜欢自己读,有的喜欢读完了给别人讲,有的喜欢让父母给自己读。顺应他们吧,切忌强调书的所谓意义、大道理,读的过程就是享受、学习的过程,孩子学到的、享受到的,可能跟作者的初衷和成人的大道理相差甚远,大人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心灵。

